

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模式对我国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義

丁绍刚^{1,2} 黄俏俏^{1,2}

(1.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部景观设计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重视对原居民生产及其生活方式原生性的活态保护,关注原住民发展愿景,并开展针对性的发展计划,促进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思想。全球生态博物馆实践已开展近半个世纪,积累了很多有益的遗产保护经验。本文通过对活态遗存的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思想的产生背景及两类遗产保护的任务、哲学观、社会价值共同性的分析,针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尚处于探索中的现实,借助成功的国际生态博物馆实践经验,从生态博物馆的区域与整体保护思想、“活态”体系保护方法及其生态教育理念三个方面加以借鉴,以推进对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践行模式;保护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130-09

Conside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museum

DING Shao-gang^{1,2} HUANG Qiao-qiao^{1,2}

(1.College of Hort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Key Laboratory of Landscape Desig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Core idea of the ecomuseum takes the live protection to original states of the inhabitants' productions and lives as the center, follows the inhabitants' wills to developments, carries out targeted development plans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otected areas. Th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ecomuseum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and has accumulated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tercommunity of generation settings, protection contents, philosophical views and social values between the live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comuseum, and proposed that to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exploration in China,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ecomuseum practic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We can learn the three aspects of ecomuseum: regional and holistic conservation ideas, 'living' system protection method, and ideas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ecious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ecomuseum; practice; protection

目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大量的农业生态系统受到了威胁,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这一项目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国是最

[收稿日期] 2017-09-10

[作者简介] 丁绍刚(1966-),男,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黄俏俏(1993-),女,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早参与这个项目并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2012年4月以来,农业部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这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2017年六月中旬,共有91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成功。由于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是资源量大面广且分布不均,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加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遗产项目尚属新生事物,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完善体系尚未形成。另外,活态的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属于一个生产系统,此类遗产因其活态性维系需求保护难度最大。其中,农民是遗产组成系统诸多要素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农民自觉自愿、民主参与是农业文化遗产能获得有效传承的关键^①。

生态博物馆自上世纪70年代出现伊始,就因强调对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真实性、完整性及原生性的保护,尤其重视保护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倡导新型自然与人文生态理念,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同,生态博物馆的全球实践也获得了巨大成功^②。生态博物馆不仅重视原居民生产、生活原真性的活态保护,而且关注原住民的发展愿景,让其重新发现遗产价值,并开展针对性的发展计划,促进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践行模式,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生态博物馆思想的缘起与演进

(一)生态博物馆思想的缘起

生态博物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由在法国博物馆界被称为思想家的雨果·德·瓦兰(Hugues de Varine)和时任国际博协主席的法国人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 é re)共同提出,其目的是为当时各界普遍关注的环境生态和遗产保护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他们将eco和museum结合创造一个新的名词ecomuseum,该词是来自缪斯女神之名法文mus é e é clat é 的转译,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简单保护模式,即建筑加藏品的模式,而是把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某个地方当成一个特定区域单位,并将其当作博物馆来经营和管理,这种全新的遗产保护是一种整体与活态的保护方式。生态博物馆还是一种专门性机构,它是通过科学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手段来管理、研究和开发特定社区或社群里的所有遗产,包括自然和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还被当成公众参与社区规划和发展的工具^③。

作为一种遗产保护的思想,其萌芽远早于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根据雨果·德·瓦兰的考证,创立于1891年的瑞典斯堪森露天博物馆,是生态博物馆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源头。生态博物馆遗产保护理念另一个发轫的源头,被认为是挪威上世纪20年代前后建立的一批“民俗博物馆”,这类博物馆的理念主张要把文化遗产和其赖以生长的地方环境相结合进行保护^④。受到斯堪森露天博物馆的启发,法国伯扎特(Beaux-Arts)博物馆馆长乔治·赫斯曼(Georges Huisman)于1936年邀请里维埃在法国建造一所民间艺术与民俗博物馆,并担任馆长,该馆于1937年建成,其首要任务是记录和阐述法国传统社会及其向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强调收集藏品要在原生地,而且必须要全面记录这个藏品所需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信息^⑤。里维埃的“生态博物馆”思想从此开始萌芽。

① 张灿强、闵庆文、田密:《农户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感知分析——来自云南哈尼梯田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 傅 斌:《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4日第5版。

③ 张庆宁、尤小菊:《试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及其实践困境》,《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④ 余压芳、刘建浩:《生态博物馆研究进展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建筑学报》2006年第8期。

⑤ Maggi, M. & Falletti, V. (2000) Ecomuseums in Europe.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can be, workingpaper 137 / 2000, IRES Piemonte, Torino.

(二)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思想及其演进

里维埃给生态博物馆下定义始于1973年,随后多次修改,直到1976年他才将生态博物馆进行最后的定义,这被业界称为“一个进化的定义”^①,强调生态博物馆应具有的一些核心思想:原生态保护是其最核心价值,正如乔治·亨利·里维埃认为它是将人类置于原生的自然环境之中,用来表现自然原生、荒原的“野性”本质;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被保护的对象是当地居民自己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是被人观光的“动物园动物”,而是当地居民了解、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当地居民不仅能够了解自己的现状,还可以追溯自己祖先生活的印记。生态博物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进化的、随着时间不断演变的,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这里的时间指的是连续而逐渐变化的过程,并非简单地凝固在某个时间段内^②;并非纯粹的社区或区域,而是一个“实验室”,一个为研究本地区居民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周围环境提供资料的实验室;是一个公共参与的平台,涉及到政府、机构、专家、当地居民等,共同设想、修建及经营管理;它还是社区发展的一种途径,通过创建生态博物馆,可以保存地方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通过梳理里维埃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思想,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样式,是对传统博物馆的突破与创新,两种博物馆具有显著的差异(见表1)。

表1 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区别^③

标准	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
场所	建筑物	地方
展示重点	收集物	整体的活态遗产
研究的优先级	单学科	多学科、跨学科
主体观众	参观者	当地居民
管理主体	博物馆和它的主体	社区和它的主体
主要目标	保护、教育	当地社区的发展

有关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与传统博物馆的异同,英国生态博物馆学家皮特·戴维斯用图示的方法进行了清晰表达(图1)。图中,生态博物馆以三个相互联系的圆圈进行表述:即由社区/社群、博物馆/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三者共同构成^④,其中,上端圆圈代表“博物馆”,不仅包括博物馆的藏品,也包括保护、研究、展览与教育,还有各种活动,如终身教育及环境教育;上端和左下角两个圆圈叠加部分包括分支博物馆、保护区以及田野博物馆;上端与右下角两个圆圈相交的部分则是区域博物馆、社区/社群博物馆和邻里博物馆。左下角圆圈代表“遗产”,其内容是基于本地环境的地方遗产保护,是生态公园、自然公园、历史遗迹保护区以及自然发展的物证。右下角圆圈代表社区/社群的参与,内容包括居民的参与、社区/社群发展以及社区为基础的区域管理。而左下角、右下角圆圈交叉的部分是历史城镇、乡村景观的保护以及民俗活动等。

① 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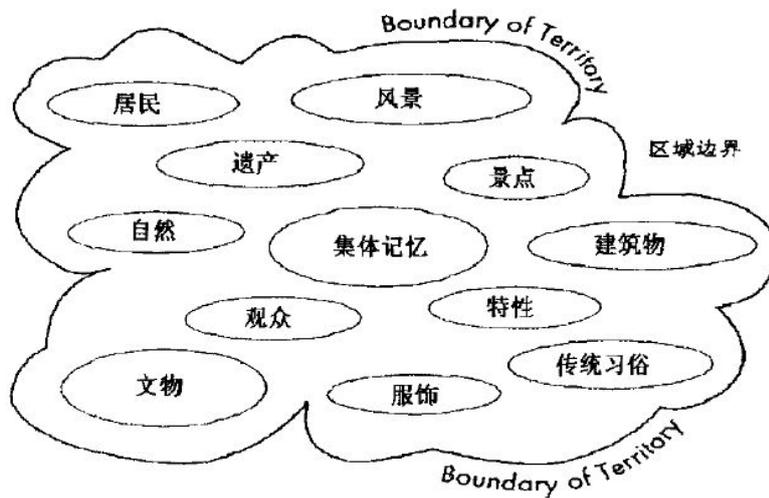
② Gerard Corsane. Using ecomuseum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Robben Island Museum and World Heritage Site, Landscape Research, Vol.31, No.4(2006), pp.399-418.

③ Germana P., Andrea G. & Ernesto M. The Potential of Ecomuseums in Strategies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Landscape Research, Vol.35, No.4(2010), pp.431-447.

④ Peter Davis.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Newcastle: Newcast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84年法国学者瑞伍·里瓦德(Reve Rivard)采用图式分析的办法很直观地表现出生态博物馆包含哪些内容(图2),强调利用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是其所有活动的需要^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再仅仅围绕“藏品”而是围绕“社区或社群”(community/population)开展工作^②,是生态博物馆的最大特征;正如德·瓦兰——法国生态博物馆之父所强调的“全部遗产”的博物馆理

① 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

②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20-21页。

念,这是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三)生态博物馆的践行模式

生态博物馆是对工业时代之前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践行体系,也是应对因全球一体化引起的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文化形态趋同性影响的一种策略。麦杰(Maggi)和法里提(Falletti)认为:“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要关注:①社区和场所发展的结合,②试图通过直接的行动去保护它的环境”^①。基于这样的需求,生态博物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出现了两种倾向:①环境主义生态博物馆(environmental ecomuseum);②社群主义生态博物馆(communitarian ecomuseum)^②,这两种生态博物馆的差异见表2。

表2 环境主义生态博物馆与社群主义生态博物馆的区别

类型	关注点	特征	典型案例
环境主义生态博物馆	社区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保护	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	拉·格朗德兰德生态博物馆 the Ecomuse e de la Grande Lande
社群主义生态博物馆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社区面临的问题和居民的愿景	将生态博物馆作为当地社会发展和资源管理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工具	勒·克勒索蒙特矿区生态博物馆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

其中,社群主义生态博物馆往往会通过一个综合发展项目,来计划其发展战略及各种活动策划,这些战略与活动包括从研究和对社区居民的训练到社会发展计划及经济多样化等各个方面。

社群主义生态博物馆实践需要在村民间达成一项协议,承诺保护与传承本地文化原真性,自觉抵制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在世界不同地区,此类博物馆有着不同的称谓,如社区博物馆(拉丁美洲)、邻里博物馆(美国)、“遗产项目”(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③,而日本和韩国由于将其与本土文化认同和“造乡运动”等相结合,生态博物馆也成为一种“文化回溯”。1998年我国建成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贵州六枝特区的梭嘎博物馆,随后陆续建成20余座,集中分布在黔、桂、滇、内蒙古等地,多为少数民族的传统村寨。近年来,生态博物馆逐步向东部发达地区推演,徽、浙、闽等地均有了生态博物馆实践。

二、活态遗存的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思想的深层联系

农业遗产被理解为“一种由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业活动组成的特定类型”。正如王思明教授认为的那样,“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的发明创造和积累传承,是一种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④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农村及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⑤可见,“具有活力的农业生态系统”是农业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是有形与无形遗产的综合体,具有所在地文脉而产生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其中,所在地农民的生产方式是决定这一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体系的关键。不难看出,农业文化遗产的这些特征与生态博物馆思想有深层的关联性。

① Boylan,P.Ecomuseums and the new museology.Museum Journal, No.4,(1992),pp.29-30.

② Germana P., Andrea G. & Ernesto M.. The Potential of Ecomuseums in Strategies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Landscape Research,Vol.35,No.4(2010),pp.431-447.

③ 苏琨、郝索:《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29期。

④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⑤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资源科学》2009年第6期。

(一) 遗产概念提出的背景相同

1971年生态博物馆概念提出的大背景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西方工业化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是触动国际博物馆界有志之士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①,生态博物馆概念应运而生。同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简称GIAHS)”项目的启动(2002年),也是由于环境恶化和不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日渐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现世界上大量的农业生态系统正面临着社会经济严重威胁。目前,生态博物馆或农业文化遗产两类遗产地都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即工业化、全球化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衰退,人口流失,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等等。保护地域传统,促进经济发展,让居民重新回到乡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任务。

(二) 遗产保护的哲学观念相同

生态博物馆暗含有系统论和生态哲学的基本思想,所谓系统论是将其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体系,分析研究该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将系统、要素、环境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重点,分析其变动的规律性。生态哲学是将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并探求其具有的普遍规律;生态哲学的拥护者们对当今社会的工业过快发展、过分强调技术的理性主义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大都市主义都提出质疑,认为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维观对农业的渗透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②。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建构也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天人宇宙系统论。具体来说,三才论是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元气论体现传统农业自然观,阴阳学说反映农作物生长发育观,五行理论对应农业框架结构观,圜道观体现农业系统论和循环观,尚中思想则反射出农业生产优化观。正是基于这些哲学思想,我国传统农业思想及技术才得以不断发展与完善,无论是时气论、土壤论、物性论还是耕道论、粪壤论、水利论以及畜牧论、农器论、树艺论、灾害论等^③,都反映出了这种整体思维的系统论。我国地域广阔,南北地理条件差异巨大,在历史进程的演绎中产生了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及生产方式,并在变迁中呈现多种形态,但无论南北,我国各地的农业文化遗产总体上都反映出“天人合一”、系统论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三) 遗产保护面临的任务相同

整体性、活态体系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保护的最重要特征,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保护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保护的目标都是一个区域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变,记录区域内人的活动轨迹,引导居民行为“自然”演化,为延续地域文化而开展发展计划,避免外力强制干预。无论是农业文化遗产还是生态博物馆,都需要在保护中发展与利用,将社区或社群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任务和目标是两者的又一重大任务,任何发展计划的制定都需与当地居民的愿景相符合,居民的民主参与是保证政策制定与设施得以成功的关键^④。

(四) 遗产保护的社会价值相同

作为历史与祖先馈赠的宝贵财富,遗产不仅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三大传统价值,还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是人类社会可以借助的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⑤。通过实施乡村景观

① 傅 斌:《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4日第5版。

② 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③ 胡火金:《开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之先河——郭文韬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评介》,《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④ Maggi, M. & Falletti, V. (2000) Ecomuseums in Europe.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can be, workingpaper 137 / 2000, IRES Piemonte, Torino.

⑤ 傅 斌:《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4日第5版。

改善的生态博物馆项目,能够促进旅游业和本土工艺的发展,可增加地区的 GDP,扩大居民就业。通过自然和人文景观恢复,推动农业文化遗迹的功能性彰显,不局限于保护历史特征和动态过程,也可为当地人的需求和愿景服务。比如考利塔·蒙大拿的埃西罗·弗哈希(Comunita-Montana Esino-Frasassi)遗产项目,由于得到了政府公共农业政策(2007-2013)的支持,他们不仅支持生态功能和相关服务,还提供与文化认同和教育相关的信息支持,这不仅提高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还因恢复历史和文化景观,开展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①。

(五)保护主体或内容有重叠

早期建设实践的生态博物馆,如瓦来·赛哈生态博物馆(Ecomuseo della Valle Elvo e Serra)都注意到环境保护,保存乡村遗产和关注社区营建等^②,乡村遗产本身就属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事实上,无论是生态博物馆还是农业文化遗产,其所保护的主体都包括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自然和人文遗产,当地人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得以生存的整体环境;保护区域内活态的原生性生态系统及其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一些生态博物馆,如意大利皮尔德蒙特(Piedmont)的梯田与葡萄园生态博物馆(Ecomuseo dei terrazzamenti e della vite),其保护的核心就是其梯田与葡萄园景观,这一农田本身就属于农业文化遗产^③。

三、生态博物馆思想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借鉴

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的近半个世纪里,全球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已超过 900 座,对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较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尚属新生事物,借鉴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思想与实践经验无疑成为可能。

(一)区域与整体保护的思想

生态博物馆没有围墙,一般在该区域文化遗产氛围最浓厚的地方建中心馆,以此向周围地区辐射,辐射范围可能是一个镇、一个市甚至一个省,这是一种区域保护与整体保护思想相结合的理念。按照加拿大博物馆学家皮埃尔·梅兰德(Pierre Mayrand)的观点,生态博物馆是“一个遍布区域的车间,他们把人口看做他们自己,对他们来说不是结束,它被定义为一个被访问的客观存在”(1982; quoted in Davis, 1995)。农业文化遗产是当地农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土地是其载体,人是其灵魂,这里的人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因集体意识形成的群体,产生同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习俗,因此,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可以借鉴生态博物馆理论,人与自然与文化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否则就会导致因保护区人口规模过小,作为遗产支撑的特定农业产量过小而难以为继。

作为我国最早成功申报的 GIAHS 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其保护过程中就严格贯彻了区域与整体保护的思想。青田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总面积 2477 平方公里,方山乡龙现村为稻鱼共生系统保护的核心区,为了对这一农业遗产加强保护,从区域整体保护出发,规划将方山乡龙现村整体纳入到核心保护区内,并将核心区之外的整个方山乡划定为过渡区加以保护、控制,从目前保护的效果看,成效显著^④。

① Germana P., Andrea G. & Ernesto M..The Potential of Ecomuseums in Strategies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Landscape Research, Vol.35, No.4(2010), pp.431-447.

② G.Corsane. et al.Ecomuseum Evaluation: Experiences in Piemonte and Liguria,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3, No.2(2007), pp.101-116.

③ Germana P., Andrea G. & Ernesto M..The Potential of Ecomuseums in Strategies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Landscape Research, Vol.35, No.4(2010), pp.431-447.

④ 吴敏芳、邹爱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和发展经验》,《世界农业》2014 年第 11 期。

作为江苏省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则是一个反面案例。中国南方河网低湿地区,为了防止洪涝,常通过开挖网状深沟或通过清淤小河道里的淤泥,将泥土堆积成垛田用以种植农作物,这种垛田在里下河地区的江苏泰州市以北区域广泛分布,江苏兴化市的垛田镇目前就保存有 2.4 万亩,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项目就位于此地。但目前对这一遗产的保护出现了一些潜在问题,如至今尚未划定保护红线,遗产保护的主体不明确,并常让位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城市规划建设征用了大量的耕地,尤其交通道路的建设,占用了大面积的垛田^①。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缺少区域与整体保护思想。因此,根据各遗产地具体情况,可以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把最核心、最精华或最脆弱地区划为核心保护区,设置展示实物与文化的博物馆与活动中心,供居民及游客活动,但需严格控制居民与游人数量,同时确保其生产、生活方式按“自然规律”演变,尽可能减少外力干预。

(二)“活态”体系的保护

生态博物馆与活态遗存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具有与在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活态”体系,以及居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以及与居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系统。如果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质的改变,遗产必将消亡,也是这两类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类型的根本。

农业文化遗产地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很多遗产地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大都是留守的中老年人,年轻人离开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如不及时纠正,终有一天这类遗产地会消失殆尽,那么这一由在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农业“活态”体系也必将消逝。因此,如何处理好独特的遗产魅力与经济发展二元关系,“唤回”离开的农民,让他们自觉地延续祖先的传统,并让遗产得以持续、发展,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的关键^②。

例如,在皮德蒙特的梯田和葡萄园生态博物馆(Ecomuseo dei terrazzamenti e della vite)案例中,朗格地区曾经因为人口极度减少而衰败。为了恢复该地区活力,重新评估该地区梯田景观的历史重要性,建立生态博物馆,通过实践也证明了这个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潜能。这个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要达成两方面的目标:(1)梯田的物质重建,恢复传统作物生产,对具有历史性的农场建筑进行恢复重建;(2)在一个更高层面,通过培训和参与使当地居民重新发现和感悟到梯田景观场所的价值,这是塑造生态博物馆功能的关键阶段。这些目标的相互作用使得梯田景观重建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广泛运动,尤其是成为了提供高质量农产品的转折点^③。

哈尼梯田是我国云南省的独特农业遗产,它分布广泛,地形复杂,田块形态与面积各异,自然与文化景观丰富。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劳作、生活,不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山地农业生产方式,也形成了极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始终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没有生产劳作是不可能保护这些传统农业系统的。然而,传统的农业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加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巨大,如何让农民愿意继续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且能够从中受益,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 2008 年起,当地政府就采取了层层承包负责制,由县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及各个农户层层签定责任书,每个区块都有专人负责。为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保护遗产的积极性,政府在做好核心区保护的同时,在核心区外围设缓冲区并适度开展旅游活动,缓冲区外再设辐射区,重点发展旅游业。对核心区因严格保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政府 and 利

① 朱会林、张小荣:《借力文化遗产支撑 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保护与开发情况》,《江苏农村经济》2015 年第 1 期。

② 但文红、刘彦随、黄娟等:《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以贵州省生态博物馆建设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③ Germana P., Andrea G. & Ernesto M. The Potential of Ecomuseums in Strategies for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Landscape Research*, Vol.35, No.4(2010), pp.431-447.

益相关者予以补偿^①。这种动态保护的思路,就是要将农民留住,同时让他们愿意继续维持传统耕作方式,动态保护恰恰也符合这个要求。

综上,维系遗产的“活态”体系是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之一,而“活态”体系维系的关键是遗产地居民有意愿坚守传统,保持其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能使他们生活富足且有尊严。因此,物质重建与文化价值重建是遗产保护的根本,两者缺一不可。

(三)生态教育的训练与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虽然都强调就地保护,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固步自封,相反它们既强调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也主张与时俱进,让遗产的演进尽量保持其“自然过程”,不受外力过度干预,这就需要当地居民的参与,也需要外来游人的配合。因此,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生态教育尤为重要,首先要对当地农民与游客普及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意义、保护策略等相关知识;其次是发挥政府引导功能,让当地农民、游客及志愿者积极投身保护事业之中,发挥他们各自专长;再次可以通过一些奖励机制和发展经济效益的措施,调动当地农民积极性,使农业文化遗产能真正活起来,并能永续发展。

一个生态教育较为成功的案例就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项目。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土地资源有限,“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综合因素,是形成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原因,也是这一系统能够长期保存的重要原因^②。为使这一农业文化遗产能够继续维系,当地政府出台多种优惠政策,主要方针是强调“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实行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为挖掘青田传统的稻鱼共生技术,建立了青田田鱼原种保护场,为培养农民稻田养鱼技术,特别制作了《青田传统稻鱼共生技术》音像;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启动了方山 GIAHS 稻鱼共生博物馆建设;为展现当地文化,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为对游人加强科普教育,举办多样的宣传与教育活动^③。这种以乡村复兴为导向,让农民尤其是年轻人愿意返乡务农,并且能够富裕、幸福而有尊严地守护传统,对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始终是一个全球性的矛盾。保护主义者为了减少人的干扰,往往主张将居民完全移出,以求保障遗产地的“自然生长”,这种明显忽略原住民、当地居民权益的保护区管理模式,经常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排斥,也使得保护工作遭遇困难^④。如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通过每年举办的千岛菜花旅游节,虽然在吸引中外游客方面较为成功,对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采取保护区管理模式,将居民与垛田景区分离,使得居民参与性低,很多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转开小商店、农家饭店等,景区的发展只提高了少数人的经济生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对遗产保护极为不利^⑤。

为解决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加强生态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国际生态博物馆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生态教育,能够全面提高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促进遗产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引导人们对当地社区文化的尊重,使当地居民能够积极分享到社会和经济利益。因此,加强生态教育应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

① 史军超:《红河哈尼梯田:申遗中保护与发展的困惑》,《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② 方丽、章家恩、蒋艳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思考》,《中国农学通报》2007年第2期。

③ 吴敏芳、邹爱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和发展经验》,《世界农业》2014年第11期。

④ 侯沛芸、李光中、王鑫:《生态旅游与世界遗产教育策略拟定之研究》,《旅游科学》2005年第5期。

⑤ 崔峰、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2期。